



开栏的话

阅读是独行时与自我的深度对话，亦是结伴时与同好的心灵共鸣。当文字在纸页间流转，那些藏在字句里的岁月温度，便有了可触的质感。为给读者提供一处探寻好书、交流感悟的互动平台，本报现开设《悦读》专栏。这里有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，有新锐佳作的看点速递，更有普通人与书相遇的温情故事。现诚向广大读者征稿：若有你珍藏的阅读感悟、私藏的好书清单，或是与书有关的难忘经历，欢迎积极投稿，让每一份阅读的力量被看见、被传递。



《少年漂泊者》 蒋光慈 著

《少年漂泊者》中的安徽镜像

吴孔文

有人说，一部小说，除了人的名字是假的，其余都是真的。这话确实有几分道理。按照这种观点品读《少年漂泊者》，就能看到百年以前安徽大地上的真切景象。

蒋光慈的小说《少年漂泊者》发表于1925年11月的上海。按照蒋光慈的说法，当时的上海世风温软奢靡，大街灯红酒绿，《少年漂泊者》像一道耀眼的闪电，给人震撼与警醒，也让太多的人透过生活的迷雾，看到底层人们的不幸与挣扎。

小说的主人公汪中是安徽西部一位佃农的儿子。1915年，当地大旱，庄稼减产严重，然而地主却不顾佃农们的死活，依旧照例催缴租课。汪中的父亲因无力缴租，遭到地主的毒打，最后被逼身死，母亲也含恨自杀。十六岁的汪中无法在家乡立足，成为一位漂泊者。在此后的日子里，他遭受了川馆先生的猥亵，恶犬的欺负，瓜农的痛打，店老板的盘剥以及军警的虐待，尝尽了人间的所有苦难，最终走上革命道路并壮烈牺牲。

1910年前后，安徽西部地区土地兼并严重，土豪地主敲骨吸髓剥削贫雇农。贫困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，往往吃不饱穿不暖，因贫富悬殊而导致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，一些活不下去的人们甚至落草为寇。《少年漂泊者》中，土匪头子王大金刚更像是梁山好汉，他说：“现在我们穷人的世界到了，谁不愿意眼睁睁地饿死，就请同我一块儿来！”王大金刚带领一帮穷哥们“专门抢掠富者，毫不骚扰贫民，并且有一些贫民赖着他们的帮助，得以维持生活。”在安徽西部地区，自古就有结义的习惯。1928年，安徽西部的金寨县吴家店地区，贫困农民以梁山结义的形式结成“十八兄弟会”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初期革命组织。团结起来的贫苦群众依靠集体的力量打击土豪地主，维护公平正义。“十八兄弟会”的成员是推动商南（立夏节）起义的骨干力量。

在《少年漂泊者》中，有一位善良的教书先生，这位先生五十多岁，心地善良，对当时的社会有着清醒的认识，“现在的世界，真是弄到不成样子，穷人简直不能过日子！倘若我有权力，我一定要做一番澄清社会的事业！”这位教书先生，原型是金寨县共产党组织创建人之一詹谷堂，蒋光慈是詹谷堂的学生。1924年，詹谷堂与共产党员袁汉铭、曾静华一起，在金寨笔架山农校成立了当地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。自此，革命在这片土地上渐呈燎原之势。

《少年漂泊者》中所描写的大部分事件，都发生在安徽境内。“你大约知道借外兵打太平天国的李大天王，开刀行的王老板，持斋念佛的段执政……这些有名人物罢？这些有名人物的生长地就是H城。”文中所谓的“H城”，也就是合肥。在合肥，汪中遇到了杂货店老板刘

静斋。笔者认为，在汪中所遇到的众多“坏蛋”中，刘静斋是最善良的一位。就连汪中自己也承认，“我的主人，说句实在话，待我总算还不错，没有什么过于苛待的地方。”“有闲工夫时，还可以看看书，写写字，学问上还有点长进。”后来，汪中与刘静斋的女儿玉梅恋爱，玉梅的弟弟为两人暗传情书。刘静斋知道真相后，并没有对汪中进行打骂，只是“哼了一声，其外什么话也没说。”并给了汪中八块大洋，写了介绍信，让他别投他店。当年的合肥，城市规模并不大，许多市民身上还保持着淳朴农民的本色，当然也不乏农民的狡黠。文中刘静斋在接待一位来布乡的乡下人时，采取欺骗的手段，完成了一笔交易，让我们看到“无商不奸”真实一幕。

与有几分土气、几分厚道的合肥人比，长江边的芜湖由于开埠较早，当年的人心更为险恶。在这里，洋货店老板陶永清“一点同情心都没有”，对待汪中像对待牛马一样，且店里所有的“伙友”都欺负汪中，商会会长也是流氓出身，穿得妖里妖气。面对爱国学生动员抵制日货，几家洋货店老板不但不配合，还想陷害凶杀学生负责人。尽管如此，与合肥比，这里激荡着新文化的思潮，不似合肥那般沉闷。在这里，《皖江新潮》天天可以看到“提倡新文化，反对旧思想”的文章，商人们为了逐利而勾心斗角，学生们因为爱国而不时上街游行，

新与旧的博弈、激进与守旧的较量在这里天天上演。同时与合肥比，这里也更加凶险，学生们因为要求抵制日货而触犯了商人的利益，如果不是汪中提前报信，学生首领几乎要遭受奸商们的毒手了。

在《少年漂泊者》中，还能听到具有安徽地域特色的语言，如“打断你的狗腿！”“天啊，你为什么这末样与我为难呢？”“顶好你莫要去”“真把我骇得魂不附体！”“莫不是那地方有强盗？”“打死我也不敢在这地方歇宿”“定以老命拼你！”这些方言俚语，即便今天还会听到。至于小说中所描写的垂柳、明月、牧歌、鸣蝉以及带露水的石头、守护村庄的黑狗，今天的村庄里亦能见到。只不过，如今的人们早已过上小康生活，大路上再也见不到衣衫褴褛的乞丐了。

蒋光慈是安徽金寨（原霍邱）县人。正如《少年漂泊者》中所描绘的一样，上世纪二十年代左右，安徽特别是皖西地区阶级矛盾十分尖锐，农民的抗租、抗税斗争此起彼伏。1929年，皖西地区先后爆发商南（立夏节）起义和六霍起义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起义队伍打土豪、分田地、建立苏维埃政权，为保护革命果实与反动派进行殊死斗争，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。



《好时光悄悄溜走》：回忆，是与过往的重逢

任诗桐

当一个作家拿起笔，往事便会不自觉地流进笔尖。追忆是文学永恒的主题，每个作家在写作时，都会不由自主地回望过去，潜入记忆的深海，捡拾那些闪光的珍珠，串成一条独具特色的项链。迟子建的散文集《好时光悄悄溜走》，便是一部作者对云烟往事的追忆与重构，一幅用文字编织的文学地图，一座探索艺术和人生真谛的精神花园。

散文集共分为四辑。第一辑以回忆往昔生活为主要内容，第二辑与第三辑是作者周游祖国各地与世界各国的杂感，第四辑为两部长篇散文，《云烟过客》详述了作者的家族史，《爱荷华日记》呈现了作者在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交流学习的生活点滴，以及与聂华苓女士的交往日常。正如同名散文《好时光悄悄溜走》的书名所言，作者在追忆过往的同时，营造出了一种怅然若失的审美感受，恰如那些美好的日子，都已随时光悄然逝去。

在《云烟过客》一文中，作者坦言，“三台站是我有记忆的开始”，那是作者与母亲从永安镇回漠河乡探亲时，由陆路改水路的中转站。结果，因途中长途汽车抛锚耽搁了行程，到达船站时，船已经驶离了岸边。“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它朝我们的目的地而去，而我们要去的我们却被抛在岸边。”终于抵达位于北极村的外婆家后，却再一次加剧了这种被遗弃的感觉，原来母亲此行是要把作者送给没有子嗣的二姨抚养。就这样，作者眼巴巴看着母亲带着姐姐乘船远去。



迟子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童年经验是创作主体写作的镜像，这一经历对作者影响至深，以至于每次回忆过去，都带着深深的失落感，落笔成章时，便给记忆赋予了某种具体的形象，并流露出了无尽的哀愁。在《猜想白天》中，“我”遥想北极村夏天的好去处，那绝不是白昼的情景，而仍然是一艘船于黄昏时分停泊岸边的形象；《棺材与竹板》里，令“我”怀念的，“只不过是已消逝的雨季那沉郁的竹板声”；《蚊烟中的往事》中，尽管“菜园依旧青翠，火烧云也依然会在西边天燃烧”，但“一家人坐在院落中笼起蚊烟吃晚饭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”；《伐木小调》里，“我”仍然怀念着的寒风和飞雪已经逝去，仍然怀念着的伐木声已不复存在。

每一次回忆，都是一次与过往的重逢。读罢这部散文集，我们不但能够随作家重回她的往日时光，同时也能勾连起自身对过去的种种回忆。那些早已流逝的岁月，如同一缕烟云，倘若不以文字做媒，便会消散在时空中。我想，这便是写作和阅读的意义所在。

（来源：中国青年作家报）

荐书

《好天气》

苏童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

《好天气》是苏童历时11年创作的长篇小说，小说以20世纪70至90年代江南城郊“咸水塘”为背景，围绕塘东蒲招娣与塘西黄招娣两户家庭的棺材纠纷、子嗣失踪等事件展开。

《好天气》延续了苏童标志性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，以少年邓朝阳的视角勾勒出一幅怪诞离奇的世俗图景。咸水塘一边是农村，一边是城市。以塘为界的两个家庭、三代人几十年的命运纠葛，随着咸水塘的彩色天空消失而烟消云散。

小说中女性群体的挣扎与抗争尤为动人——无论是因婆媳矛盾引发争端的蒲招娣，还是因儿子失踪而神志恍惚的黄招娣，她们在时代夹缝中求生存的姿态，既承载着传统女性的隐忍，又闪烁着争取自我价值的微光。

编者按

银幕为卷，热血为墨，历时三载，《志愿军》三部曲以恢弘的史诗格局，完成了对抗美援朝这场“立国之战”的银幕书写。影片从决策帷幄的千里之外，到血肉相搏的前线战场，全景式地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。

75年前，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国家命运，跨过鸭绿江，打响了保卫和平、捍卫主权的正义之战。如今，三部曲通过震撼的影像叙事，不仅再现了战场上的烽火硝烟，更深刻揭示了国家命运与个体牺牲的血脉交融，展现了钢铁洪流与坚强意志的激烈碰撞。

本期《影评》我们将一同走进这段光影铸就的史诗。透过银幕，更深刻揭示了国家命运与个体牺牲的血脉交融，展现了钢铁洪流与坚强意志的激烈碰撞。

致敬最可爱的人——

《志愿军》三部曲的光影诗篇

《志愿军：雄兵出击》：“立国之战”的决心

作为陈凯歌导演“抗美援朝三部曲”的开篇之作，《志愿军：雄兵出击》以全景式叙事，再现了新中国立国之初的战略决策与战争始末。影片不仅聚焦于高层的战略博弈，更将视角投向战场前沿，极具真实感的战斗场景，在呈现战争残酷性的同时，其最核心的叙事任务，是回答一个萦绕在历史与国族记忆中的沉重诘问：“我们为何而战？”

电影院里响起炮弹的轰鸣，屏幕里志愿军战士们在冰天雪地中冲锋。但它不像很多战争片那样，一上来就打得热火朝天，而是耐心地告诉我们，当年那个刚刚成立、一穷二白的新中国，是顶着怎样的压力，做出了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”这个艰难又伟大的决定。

影片采用多线叙事，既展现了指挥层的运筹帷幄，也刻画了前线将士的浴血奋战。在松骨峰阻击战中，三连官兵在弹尽粮绝的阵地上，以百余人的兵力阻击数十倍于己的敌军，坚守八小时不退，用生命为主力部队赢得了宝贵战机。与此同时，影片平行穿插新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据理力争的外交场景，通过代表团的铿锵发言“时代



不同了，情况变了！”，展现了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坚定立场，构建起战场与外交相互呼应的叙事格局。更让我们明白，这场仗不是为了别人，就是为了我们自己能挺直腰杆过日子，让后代不再受欺负。

影片中用了不少篇幅，展现了那个不眠之夜。当时的新中国，刚刚从战火中走出，百废待兴，一切都需要从建设。而新中国的建设者们所要面对的，是世界上装备最先进、实力最强大的军队。这情形，就像一个家还没完全安顿好，却不得不准备迎接一位不请自来、力量悬殊的闯入者。选择迎战，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；但若退让，烽火很可能转眼就烧到自家门前。

另一条线特别刻画了志愿军战士作为普通人的真实面貌。他们并非天生无畏，而是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。他们会冻得瑟瑟发抖，会害怕天

《志愿军：存亡之战》：烽火家国路

满足于呈现战争的宏大与残酷，而是巧妙地通过李默尹、李想、李晓明一家三代人的命运轨迹，为我们切开了一个理解历史的独特剖面，让这场关乎国运的存亡之战，拥有了感人至深的人间烟火气。

影片中身为军委参谋的李默尹，既是运筹帷幄的指挥者，也是牵挂子女的父亲。这种双重身份的塑造，让角色既有历史的厚重感，又不失人性的温度。儿子李想在阵地上浴血奋战，他的成长与结局，是无数为国捐躯的年轻战士的缩影。妹妹李晓明送他的一朵“死不了”小花，被他珍藏于笔记本中；经父亲、哥哥之手，最终传到李晓明口中的一块纸包糖，更是穿越战火、串联亲情的温暖信物，浓缩了残酷战争中不灭的人性光辉。而女儿李晓明从最初的柔弱

翻译，成长为一名坚毅的战士。她在前线唱响的歌曲，不仅点燃了将士们保家卫国的豪情，也彰显了女性在战场上的坚韧力量。这一条情感主线告诉我们，历史不是由单一维度书写的，国家的存亡与家庭的命运紧密交织，使“保家卫国”的口号化作了具体而微的个人选择与情感驱动。

在人物塑造上，影片也通过多条成长线索，勾勒出一幅立体鲜活、令人动容的英雄群像图。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影片对象征手法的娴熟运用。贯穿全片的七星瓢虫意象，既象征着永不熄灭的希望之火，也暗含着对和平的深切渴望。这一意象的首尾呼应，不仅增添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，更让主题得到了诗意的升华。

在展现阻击战的过程中，影片特别突出了志愿军以弱胜强的战争智慧。面对美军的钢铁洪流，189师创造性地实施“钉子计划”，将全师化整为零，分散成200多个小阵地，以“人在阵地在”的信念迟滞敌军。188师则运用挖水坑、摆“品”字形石阵、挖掘地道等“土办法”设伏，用炸药包、迫击炮等武器对抗坦克，将勇气与智慧结合到了极致。反坦克作战的悲壮与智慧，成为影片中令人震撼的高光时刻。

《志愿军：存亡之战》通过对历史细节的精心雕琢和对人物内心的深入刻画，让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一场战役的残酷，更是无数平凡个体在战火中绽放的人性光辉。这部作品既是对历史的深情回望，也是对英雄精神的真诚礼赞。（本文素材来源于网络）



当大银幕上的风雪淹没战士的身影，当炮火的光芒一次次划破寂静的黑夜，电影《志愿军：存亡之战》承接《雄兵出击》的叙事脉络，将我们带入了抗美援朝战争中惨烈的铁原阻击战。1951年5月，中国人民志

愿军第63军刚刚结束了持续一个月的作战，就受命进驻铁原战场，正面对抗“联合国军”4个师。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，终于把敌军打上了谈判桌。这场战役堪称一场“以少胜多”的绝境抗争。然而，导演并没有

“志愿军三部曲”的收官之作，《志愿军：浴血和平》以“边打边谈”的双线叙事，填补了国产战争片对“谈判与作战并行”的叙事空白。影片通过战场与谈判桌的交替推进，首次系统呈现了上甘岭战役的残酷细节。在不足1平方米的坑道中，战士们用身体传递体温、用意志对抗极限；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的瞬间，通过特写与慢镜的融合，将“钢铁意志”化为穿透银幕的震撼力。与此同时，板门店谈判桌上长达747天的拉锯，展现了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。谈判代表们寸步不让的坚守，战场上的每一次冲锋，每个画面都在诉说：没有战场上的寸土必争，就没有谈判桌上的平等对话。

在展现战争宏大叙事的同时，影片将镜头继续对准了战争中的个体。从松骨峰血战中幸存的老兵，到坚守中立区纪律而牺牲的年轻护士，到在翻译岗位上奋战至生命最后一刻的文职军官……这些角色并非为了堆砌悲壮，而是试图让观众看见，历史书中简略的记载背后，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。他们不是完美的英雄，却有着最朴素的执念——用自己的牺牲，换取后人不再经历战争，让“和平来之不易”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，也让当代观众尤其是青少年，能真正理解“75年前的年轻人何为而战”。

电影的结尾处，停战协议签署时万名战士齐声应答“到”的场景，与现实烈士遗骸归国的画面交织，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，更为三部曲画上震撼人心的句号。（文字由本报记者根据网友评论整理）

